

《2010~2011中国出版业发展报告(中国出版蓝皮书)》发布——

传统出版从业者暂不必为饭碗担忧

本报记者 王波

iPad入市中国，引发抢购风潮，并成为引领时尚的新闻阅读终端，再加上一些电子阅读器在2010年频频面世，让一些传统出版行业的从业者开始担心自己未来的饭碗。

不过，看了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组织编撰的《2010~2011中国出版业发展报告(中国出版蓝皮书)》后，他们暂时可以松一口气了。

“数字出版和传统出版目前还处在相互融合的阶段。”蓝皮书主编、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院长郝振省说。他所在的研究院隶属于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是我国唯一的国家级新闻出版专业研究机构。

6月17日，这本由中国书籍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出版蓝皮书》正式发布，其主报告按照出版业的编、印、发、科、供、贸等出版产业链进行架构。这已是第七本中国出版业年度发展报告。

与此前不同，国家在2010年10月首次提出要“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在此大背景下，“转变发展方式”成为中国出版产业发展的主线。

在对过去一年的情况进行梳理和分析后，蓝皮书总结了2010年中国出版业的7大转变：由单纯追求GDP增长向注重扩大规模与注重传播文化相结合转变，由事业与产业混合发展向事业与产业联动发展转变，由分散式发展向集团化、集群化发展转变，由产品运作向产品运作与资本运作相结合转变，由传统出版向传统出版的升级与数字出版转变，由国有出版单位垄断向国有、民营相互合作竞争发展转变，由单纯依靠国内市场向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转变。

而读者能直接感受到的转变，是出版业“由传统出版向传统出版的升级与数字出版转变”。参照蓝皮书里的数据，在2009年，数字出版总产出已达到799.4亿元，总体经济规模超过了图书出版。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则顺势而为，在2010年10月发布《关于发展电子书产业的意见》，并在11月4日公布了首批电子书牌照，共30家企业获得了电子书从业资格。

在被称为“全球电子书元年”的2010年，仅仅在中国，电子书销量从2009年的80万台跃升至300万台，占到全球市场的20%。但北京开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研究总监杨伟认为，数字出版业务尚没有产生明确的商业模式和盈利预期，因此数字出版对于出版行业的发展机遇也还需要进一步解读。

香港三联书店副总经理叶佩珠的看法，也有些类似。“电子阅读是大趋势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但电子书这种新市场还要投资观察几年，还要解决网上收费模式、版权等问题。”她在为蓝皮书撰写的《2010年香港特别行政区出版业报告》中写道。她认为，出版业现阶段只能牛刀小试，为日后做准备和试探。

叶佩珠的报告是蓝皮书里的14个专题报告之一。其他还包括新闻出版产业分析、图书出版、期刊出版、报纸出版、报业广告、音像电子出版、发行业、印刷业、数字版权保护、出版科研、新闻出版产品与服务出口贸易以及台湾地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出版业等13个专题报告。

由台湾南华大学出版与文化事业管理研究所助理教授黄昱凯撰写《2010~2011年台湾地区出版产业报告》里，他指出“台湾出版产业链在电子书产业的真正进展仍不多”。

对港澳台及内地的读者来说，制约他们进行数字阅读的主要因素还是“数字出版的内容供给”。由于版权和利益分配等问题尚未解决，在黄昱凯看来，两岸的电子书市场还缺乏一个好的良性循环。在这种情况下，过多的电子阅读器不过是缺乏良性循环的副产品。

“数字出版短期看终端，中期看平台，长期看内容。”郝振省说，这几乎已经成为业界共识。他认为，内容生产者和平台开发者应该扬长避短，各守其土，通过合作为读者提供更好的内容和内容和服务。

这一点也得到黄昱凯的认同。“强化电子阅读器与出版社的合作关系，才是促进电子书产业快速发展的积极策略。”

因此，在郝振省看来，传统出版行业的优秀从业者完全不必忧心忡忡，数字出版从业者离不开内容。而传统出版行业的这支编辑队伍，已经形成了独特的编辑风格，并有深厚的文化积累，这对以后进行数字出版来说，是一笔巨大的财富。

独立书评

王思维

“如果没有小说，我们将不会意识到自由对生活的重要性。”作为2010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作获奖致辞时曾这样说。

那是2010年12月7日，站在斯德哥尔摩的讲台上，他要赞颂阅读和虚构。作为拉美“文学爆炸”一代的代表人物，略萨也许是近几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中最为中国读者所熟悉的名字。因为他的作品在中国译介得相对充分，对中国当代文坛影响很深。

《谎言中的真实》是其中的一本。不过，这本书是略萨的创作谈，记录着一个作家有关创作的真相灼见。但在这本旧书里，读者可以真实地感受到一个作家对自由的坚持。

《谎言中的真实》出版于1994年，名字源于书中收录的一篇同名文章。谎言和真实，其实是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几乎每个小说家都为此辩驳过。略萨认为，小说在撒谎的同时带给人真情。也就是说，小

“谎言”需要捍卫

说的谎言满足了人们对现实的不满。但这只是暂时的，“每当小说暂时平息了人们的不满，也就挑起了人们的不满，刺激了人们的欲望和想象力。”这种欲望和想象力“可能会变为反抗，变为对现行规定的不服从态度。”

略萨所说的反抗是与萨特意义上的自由相关联的。在拉美独裁政府的统治之下，历史被改写，书籍出版要受到严格的审查，现实被压缩为单一的平面，所谓的“真实”，实质上是一种极为荒唐的虚构。更为严重的是，这种“真实”被当做唯一的真理，成为判定和指责小说“说谎”的依据，进而限制人们“说谎”的自由。从这个意义上讲，捍卫“说谎”的权利就是在争取自由，正如略萨在文章结尾所说，“虚构小说是对任何政权或意识形态下的生存的可怕控诉”。

此外，《谎言的真实》这本书中还收录了略萨的部分访谈、回忆录和书评。

值得注意的是，略萨在一段访谈中简略地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文学观念，即“让

小说包罗万象”，这种“包罗万象”的小说被他称为“总体小说”(Novela Total)，这后来也曾引发关注和讨论。总体小说力求最大限度地容纳现实，通过对现实的虚构化处理，最终“建造起一个几乎与真正的现实同样完整和多样的现实”。对于想要深入了解略萨的人来说，这一概念是必不可少。

通常，作家谈文学的书因其晦涩难懂而让普通读者望而却步，这本书却例外。略萨幽默的谈吐和流畅的语言极具吸引力，尤其是书中“我的人生与文学道路”这一部分，占据了整本书的将近二分之一。作家幽默而详尽地描述了一个懵懂的少年如何一步步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其中不乏许多精彩的故事和八卦，作家父亲(在略萨还未出生的时候突然消失又在十年之后突然出现)的专制暴力、军校生活的恐怖、与妓女的接触、与胡利娅姨妈私奔结婚等等。隐藏在八卦之中的，是作家对于现实越发清醒的认识。例如，在描写莱昂西奥·布拉多混乱的军校生活时，作家谈

到这个“用缩小的方式复制了秘鲁种族和地区差别”的军校，使他得以发现他所生活的国家究竟是什么样子。他开始意识到“相当一部分可怕的暴力——我觉得是可怕的东西，对于不如我走运的学员来说是生活的自然条件——正是来源于这个学员们种族、地区和经济水平的混杂。我们中的多数人把从小养成的偏见、情结、故意以及社会与种族仇恨带进了这个修道院式的空间，汇入了个人关系和官方关系之中并且找到了在那些使得恃强凌弱和过火行为合法的礼仪中发泄的方式，比如洗礼和学员之间的军人等级关系”。

暴力逼迫着一个16岁的少年迅速成长。然而有趣的是，正是在这样一个极端不自由、极端压抑的环境之中，略萨由替人写情书开始逐步成为一个书写“谎言”的作家。

从“文学爆炸”的上世纪60年代到今天，半个世纪已经过去了。尽管我们试图相信“明天会更好”，但现实并不如我们所展望的那样乐观，全球范围内的暴力依



然存在，依然威胁着人类的生存，“说谎”的自由依然得不到保障。

让人感动的是，在2010年的获奖辞中，已经74岁的略萨依然像我们在《谎言中的真实》中所看到的那样，坚定地捍卫着“说谎”的权利。他坚信，充斥着“谎言”的文学能够促使我们致力于减少暴力的行动，“尽管减少暴力并不意味着能够终结暴力，幸运的是，我们的历史是一个永不终结的故事。因此，我们需要继续梦想、阅读和写作。通过这种方法，我们最有效地缓解了我们对现状的忧虑之情，对时间流逝的恐惧，通过文学，我们能够化不可能为可能”。

逼近真实的切·格瓦拉

历史笔记

实习生 陈倩儿

新近公开的切·格瓦拉日记或许能让读者更好地了解这位著名的革命领袖。2011年6月14日，西班牙语版《一个战士的日记》在古巴首都哈瓦那出版，切·格瓦拉的遗孀阿莱达·马奇与他的一个女儿参加了签售仪式。这天正值切·格瓦拉诞辰83周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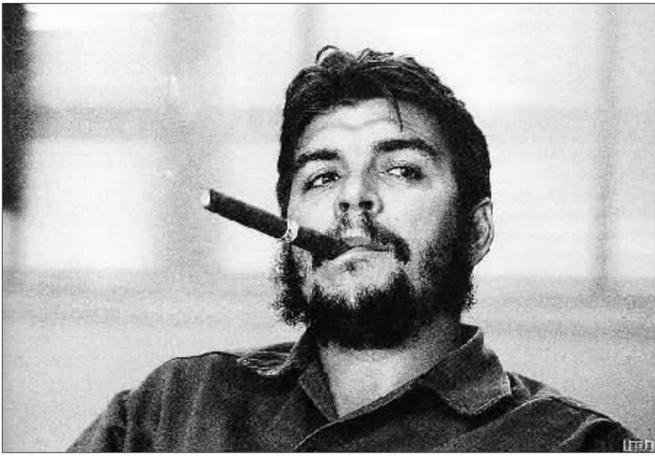
在这些此前从未公开出版的日记里，切·格瓦拉记录了他自1956年12月1日踏上古巴的土地，直至1959年1月1日古巴革命胜利前夕的经历。这期间，他与菲德尔·卡斯特罗并肩进行游击战，最终推翻古巴前总统巴蒂斯塔的独裁统治，卡斯特的权力也因而得以确立。

据了解，这些日记很可能更真实地披露了卡斯特罗与切·格瓦拉的关系。一直以来，这两个红色革命斗士之间的关系被描述为父子般的亲密。该书的出版商透露，切·格瓦拉虽然随军出身，但热爱写作，不过他的字却写得“很糟糕”，编辑们不得不花费特别长的时间去解读他的手迹。

当然，这些“糟糕”的手迹看来并不会影响切·格瓦拉的偶像形象。

“今天很多喜欢切·格瓦拉的中国人，其实并不知道他具体是干什么的，只是喜欢这个形象，这个符号。”凤凰周刊主编师永刚说。他曾经策划并在中国出版《切·格瓦拉画传》与《切·格瓦拉语录》。师永刚非常期待这些日记在中国出版，希望中国读者更了解切·格瓦拉的“真实想法”，从而了解一个更加真实的切·格瓦拉。

生于阿根廷的切·格瓦拉曾在布宜诺



斯艾利斯国立大学医。大学毕业后，他选择离开富裕的中产阶级，先后投入多个拉美国家的红色武装革命。1967年，他在玻利维亚的革命失败后被捕，并被杀害，时年39岁。

此后，切·格瓦拉的经历和故事几经演绎和传播，他一度成为全球共产主义运动者与西方左翼人士追随的神圣偶像。进入21世纪，切·格瓦拉的形象更加广为流传，并且在青年群体中不乏市场。无论是在第三世界国家，还是在发达国家，这个革命烈士的头像都可以轻易地在海报、T恤、背包、钥匙扣或香烟盒上被找到。

无数人因而记住了切·格瓦拉头上的黑色贝雷帽，嘴上叼着的雪茄，一头卷曲的长发，以及那犀利而忧郁的眼神。而透

过那些轻易便能找到的产品，切·格瓦拉似乎走下了神坛，转而成为一个符号，代表着一种时尚、自由而叛逆的生活。

“今天，切的形象被解释得越来越酷，传播得越来越广，但其实这离真正的切，是越来越远了。”在师永刚看来，这是一个令人无奈的悖论。

与这个酷炫形象恰成对照的是，在今天的古巴，民众心目中的切·格瓦拉，仍然维持着一种正统高大的神圣形象。

北京大学西班牙语在读博士于师洋，曾赴古巴交流学习。她在古巴的一年几乎每天与切·格瓦拉一同度过：在首都哈瓦那，切·格瓦拉的海报、明信片与半身纪念碑随处可见；切·格瓦拉的名字每隔几天就在报纸上出现一次；在前身为工业部的内政部7层办公大楼上，切·格瓦拉的大型镂空头像长期悬挂……

古巴的老师和朋友告诉这名中国留学生，他们崇敬的这位革命英雄，在与卡斯特罗一同夺得革命胜利后，曾先后担任古巴国家银行行长、工业部长、中央计划委

你避不开思想中的暗格

——读《幸福，在幸福远去的时代》

随意翻读

杨向荣

每个人体察世界的框架不同，认识世界便怀着某种先入之见。但是，人们不见得始终清楚这个先入之见是什么。这个框架相当于写作的暗格。在暗格和现实互相调整与适应中，我们对世界事物的真实边界判断得更准确，更清楚，更有层次感。读威廉·格纳齐诺的小说，我格外留意作家本人或者主人公思维和意识中的暗格，它既把叙述者随时随地所思所感纳入秩序，又用极有趣味的形式把作者的意识流固化成型。

在《幸福，在幸福远去的时代》里，格纳齐诺把男主角安排为哲学博士，同时却在某家洗衣公司做部门主管。这个安排别有用心。格纳齐诺的小说擅于生活中被人忽视的现象进行别致的观察、挖掘和妙评，并达到了随心所欲不逾规矩的境界。但同时，太多“陈腐的暗格”制约着他的别致。格纳齐诺似乎深知这点。因此，他让哲学博士走进原汁原味的生活——这个被符号化的博士绝非形而上学的呆板学徒，而是忠诚践行柏格森的意识流学说的现代弟子。在小说中，任何目力所及的现象都可以在他内心触发意识流的联想。他把观察的别致和联想的独特结合起来，二者互相交融，难分彼此。在他对于生活的还原中，那些制约他的暗格被淡化了。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历的宏大事件和场面毕竟是少数，想直接了解人的形形色色并没那么容易。但我们有格纳齐诺不拘一格、探幽入微的、深入到社会、街头乃至卧室的无所不在的意识流，来扩张我们的经验和体验。这就是优秀作家的贡献。格纳齐诺的每个句子都在幽默上靠，但他绝不来吃力、干笑的滑稽，那是德国式幽默，也是出产了如苏星汉的哲学家的德意志民族的独特产物。

读格纳齐诺的句子，我总是想起量子力学中的测不准原理：粒子在某个时刻的位置与动量，是不能同时准确地给出。物理学说，量子行为不允许我们以经典的

方式描述它，对粒子的一次测量会直接影响其量子行为。我想，对事物的观察肯定会影响到事物的活动。我们对事物的观察受制于观察工具和观察者主观性制约。这意味着，只要我们想观察事物，就永远不可能看到事物的本来面目。看到的都是被观察“干扰”过的事物的状态，这正是作家最需要捕获的状态。

格纳齐诺让哲学博士来观察日常琐事，就是想让他观察出不同于白丁眼中的事物状态来，创造出“有深度的变形”。把原本平平淡淡的事情讲得妙趣横生而又不过度扭曲，绝非想做就能如愿，这需要阅读，需要哲学，需要别致的暗格共同努力。格纳齐诺设计出这个博士小人物，脑子忙个不停，替我们津津有味时又无苦涩地呈现和品尝着日常琐事中的妙趣和别致。我以为最有魅力的叙事风格就是把无聊的事物描绘得有趣有味，切入的角度尽量别致却不损害事物的原貌。把看似根本没有可笑性的东西西化作有趣的说法——这才是大师才华着力的地方。深刻的作家常有而幽默的作家不常有，吸引我阅读的是机智和幽默并不完全是崇高。

于是，我们在格纳齐诺的小说中看到这个高智商、爱思考、勤感受的观察者、体验者、叙述者，但这个叙述者始终甘愿凡俗小人物的立场和角度来观察事物，来想入非非。这位叫格哈德·瓦尔利希的博士对很多习以为常的事情都有颠覆性的感受，他对时间会把我们每个人都变成什么充满了怀疑。他感觉其实大家都很孤独，甚至周围的事物也孤独，最孤独的是那些被锁在停车场汽车里的动物。他说，人们会被充满痛苦地发现，爱这项艰巨的任务是多么不容易被重复，从痛苦中会滋生对爱的畏惧。吃过爱的苦头的人突然害怕痛，也许再一次做费力的无用功。人们总是幸福了还想更幸福。在这位博士的意识活动中，正经的、忧伤的、有趣的体会会随时地地进发。这位博士还是我所见文学作品中性欲最强的博士，在哲学博士中可谓鹤立鸡群。不过，格纳齐诺借助博士之口对男女情事的描写，同样是我所见最考究和有趣的了。

读书识人

绿原：孤独中怒放

以年轻人的眼光看老年人，无论他们年轻时经历多么非凡，都是一页翻过去的历史。在前者看来，他们仿佛生下来就那么老，永远不会懂得他们易感的心。岂知那些长满皱纹的心，原也是“一只折断的灯笔，里面燃起一朵小小的风琴”。

诗人绿原在上世纪50年代写这首《手语诗》时，正作为“胡风反党集团”的一分子之一被单身监禁。囚室里每一分钟的沉默和隔绝，对他都是难耐的折磨。一个偶然的机，他得知同伴路翎也被关在隔壁。他每天发出悠长可怕的狼嗥——“我不是反革命……”精神已经完全崩溃。在这里，孤独是比迫害更可怕的敌人。

王培元新书《永远的朝内166号·与前辈灵魂相遇》，可谓是对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不成样子的怀念”。林贤智在这本书的序中说，“由传统士人蜕变的现代知识分子，历史负担无疑是沉重的。但知识精英与社会大众不是分头并进，而是后者瓦解和吞并前者……知识分子的命运史，其实是一部中国现代史”。绿原是其中很具代表性的一个。

绿原在1954年给妻子的诗《小小少年》中写道：别让花香鸟语迷住我们/别让小水流冲垮我们/别让贫贱的风霜打蔫了我们/别让苦难的雷电击散我们。然而时间仅仅过去一年，苦难的雷电就把他们折断了。

1955年5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编者按指出：剥离假面，揭露真相，帮助政府彻底弄清胡风及其反党集团的全部情况，从此做一个真正的人，是胡风及胡风派每一个人的出路。



安街上散步。事情究竟严重到何种程度，他们没有、也不可能察觉。那晚他们匆匆告别，没有想到一别就是二十多年。

说绿原是“胡风反党集团”中的美籍特务，源于他多年前给胡风的一封信。“1944年我在重庆复旦大学外文系读书。和其他学生一起，由校方统一征召，为来华参战美军充任译员。因受训期间被当局认为‘有思想问题’，分配时被通知由‘航委会’改调‘中美合作所’。当时我不胜惶恐，又举目无亲，只能向胡风求助。这就是1955年加以删节后公布出来的。证明我是美籍特务的那封信。胡风当时并不了解‘中美合作所’是个什么机构，但认为无疑是危险的。于是立即答复——那里去不得，并帮他四下寻找就业机会。”

《永远的朝内166号·与前辈灵魂相遇》中记录了绿原与公安机关审讯员的如下对话：

审讯员：“……你什么时候从那里出来的？”

“我根本没有到那里去过！”绿原说，“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编者按指出：剥离假面，揭露真相，帮助政府彻底弄清胡风及其反党集团的全部情况，从此做一个真正的人，是胡风及胡风派每一个人的出路。

1953年，绿原先被监禁在西单大磨盘院，后被转入东总布胡同，完成了“交待认罪”的全过程。他被迫承认自己是

“反革命”，之后被转入秦城监狱。“在不足十平方米的囚室里，几乎每天，他沿着对角线，走过来，再走过去。有时停下来或是蹲下身，低头看从土缝中爬进爬出的蚂蚁。”

他的孤独使他迸发了另一些诗行：告别了亲人，也告别了人民，甚至告别了人类/没有分秒，没有昼夜，没有星期，没有年月/再没有声音，再没有颜色，再没有变化，再没有运动/漂流在时间的海洋上，坚信一定会发现一个新大陆……他成为在时间洪流中探险的“另一名哥伦布”。

孤独中的绿原“不再发誓，不再受任何誓言的约束，不再沉溺于赌徒的谬误，不再相信任何概率，不再指望救世主……”

为了不让精神不至崩溃，他开始读外语书籍《列宁回忆录》、《战争与和平》。为了看“文艺与政治的歧途”，他认真读马列经典原著。他给自己制订时间表。从1956年到1962年被监禁期间，绿原默默修德语文。

1962年，公安部对其“免于起诉”。时任中宣部副部长林默涵与之谈话时感慨说，这几年隔离也有好处，学到一门外语，要是在外面，像我们这样忙忙碌碌，很难学到什么。

绿原先后直接从德文翻译了《浮士德》、《黑格尔传》、《茨威格散文选》、《叔本华散文选》等。而《浮士德》音律严格，从来被视为德文翻译的险峰。一个英译本曾被嘲讽为“将音乐译成语言”。

杨澜在《同一世界》中提到，在提问王光美当年被强迫穿上旗袍、戴着乒乓球做成的项链的感受时，或许王可以回答，“看到的全是周围的人性恶”。但王说：我不想去追究。曼德拉被关在大西洋小岛上27年，受尽三个白人看守的侮辱和虐待。但是1991年他就任总统却邀请他们到场。曼德拉说，“我如不能把悲痛与怨恨都忘掉，那么我仍在狱中”——他们都选择不再做怨恨的囚徒。绿原也是一样。他做了自己心域的主人。

